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毛华奋翻译研究 论文选

Selected Papers on Translation

■ 毛华奋 著 By Mao Huafe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融通中西·翻译研究论丛

毛华奋翻译研究 论文选

Selected Papers on Translation

■ 毛华奋 著 By Mao Huafe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华奋翻译研究论文选 / 毛华奋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308-09708-6

I. ①毛… II. ①毛… III. ①英语—翻译—文集
IV. ①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137 号

毛华奋翻译研究论文选

毛华奋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封面设计 小 幺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75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708-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毛华奋教授发来他的《毛华奋翻译研究论文选》电子稿，嘱我写序。读完全书，我欣然命笔！

毛教授是我的师兄和老朋友，曾一起在原杭州大学求学、工作。他年龄比我大一岁，又比我早一届毕业，当之无愧是我的师兄；毕业后我们都留校工作，就成了同事。20世纪70年代，毛教授主动请调回家乡台州，去当时的台州师专（浙江师院台州分校，现台州学院）任教。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爱好，使我们一直保持私交和学术上的联系。

毛老师回家乡高校任教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家乡培养英语人才（中学英语教师为主）上，但不忘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正因为有实践和研究作为教学的后盾，因此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现在，除遍布台州和全省各地数以千计的中学英语教师外，他的许多学生还成为各地高校英语教学的骨干，其中不少是博士和教授，还有些是出色的国家行政干部。

我们这一代高校教师，在教学之余坚持学术研究，没有个人对追求学问的热爱和执著，是难以有多少成就的，这是因为当时高校乃至全国的政治气氛使然。今天，高校领导鼓励教师搞研究，而作为高校教师，如果没有扎实的科研功底，一般来说也很难成为出色的、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科研是教学的后盾，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把教学和科研分家的。我个人就有过这样荒诞的遭遇。1983年，校领导认为我可以晋升副教授了，但系里不同意。一位当时的党总支副书记代表评委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我问，我在哪方面还不够条件？他说，我的科研成果是完全符合条件的，就是教学还需努力。我又问，学生对我的教学有什么意见？他回答说，意见倒是没有，学生对你教学评价不错。但如果你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教学就更好了。对这样的回答我只能无言以对。这在今天听来

可能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了，但在当时确实如此。我之所以提及这件小事，倒不是因为我对此事还耿耿于怀，而是想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不容易的。与今天的学术气氛相比，当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当今的学术研究，出现了另外一些不良倾向。这就不是这篇序言所要论述的范围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相比于在省城原杭州大学工作的我，华奋兄在地方高校任职并承担开拓性繁重的教学工作，他在业余搞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比我差多了。据我了解那里当时与外界联系与交流不怎么方便，学术气氛相对较差，信息也较闭塞，可以想象他要做一点研究工作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得做出多大的努力，要有多强的毅力！

再谈谈翻译研究。我认为，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解释翻译现象，揭示翻译本质。这基本上是属于纯理论研究，或曰宏观研究。二是探讨两种特定的语言与文化相互转换的规律，研究翻译策略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这基本上是属于应用研究，或曰微观研究。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应偏废任何一个方面。

但综观我国 1949 年以来的翻译研究，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重视了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那么，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译论的引进，逐渐转向了翻译的纯理论研究。尤其是到 90 年代后期和进入 21 世纪之后，纯理论的研究成了一种风尚，好像只有纯理论的研究才是翻译研究，有形无形地贬低了应用理论的研究。这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所谓“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

我本人比较主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上。翻译理论，不管是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理论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指导翻译实践的。纯理论研究有助于译者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这个正确的翻译观在宏观上能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同时，也能为翻译的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但更能对翻译实践起到直接指导作用的，是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今天的翻译应用理论研究，应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应用理论研究。由于纯理论翻译研究的发展，给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指导，为今后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研究提供了理论元素，因此，今天的翻译应用理论研究，应该是在翻译的纯理论观照下进行，或者说，翻译的微观研究，应该在翻译的宏观研究观照下进行。这样，能使我国的翻译研究走上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相互结合、

相互促进的道路，而不会再发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我在撰写这篇序言的过程中，收到了国防工业出版社郑艳杰同志的来函，说该出版社联系了方梦之、李亚舒和王忠廉三位教授，就建立和出版“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事宜进行了探讨，并立即付诸行动。这说明，出版界和翻译界都意识到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可说是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事实也是这样：进入 21 世纪之后，国内外对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都有所加强。

从事应用翻译研究的人员，至少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否则难于总结实践经验，并把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二是要有相当扎实的翻译实践经验，否则谈翻译策略或技巧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从事翻译教学的高等学校教师，更能体会到翻译应用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这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能力，其成果也往往能直接应用于翻译教学。

毛华奋教授的《毛华奋翻译研究论文选》就是理论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三结合”的成果。论文选的文章，不论是谈英汉翻译中词义的把握、汉英翻译中的“中式英语”，还是国俗语的汉英翻译和古诗英译比读与研究，以及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的培养，基本上都是属于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这是他紧紧围绕自己的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他没有受到当今翻译研究中只重视纯理论研究时尚的影响，而是考虑到教学和实践的需要，专注于自己认定的研究方向，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当今学术界浮夸风气盛行之时，就更值得赞扬了！

是为序。

郭建中

2011 年 11 月 3 日

于美国费城郊区

目 录

CONTENTS

我与翻译的不解之缘(代前言)	(1)
----------------------	-----

主题一 英译汉要把握词义理解

词义层次与翻译	(11)
期刊译文的误译例析	(18)
外来语的吸收与新术语的翻译	(26)

主题二 汉译英要防止“中式英语”表达

由汉译英产生的“中式英语”窥探	(33)
“实用英语”翻译质量刍议——兼谈“中式英语”问题	(40)
探讨几项重要旅游资源的英译	(46)
“干部”如何英译?	(54)
新时期流行新词语及其翻译	(57)

主题三 国俗词语是汉译英的一大难点

论语义的国俗性与国俗词语的可译性	(65)
名物不同 传实不易——谈中国特有事物的名称和概念的汉译英	(75)
谈国俗词语汉译英的技巧	(82)
历史国俗词语汉译英的几个方面	(87)
漫谈中译英的“三难”	(92)

主题四 古诗英译的比读与研究

古诗汉译英中国俗语义的亏损和补偿	(101)
谈古诗词中词语歧义多义的误译多译	(110)



汉诗英译之“形式”述评·····	(116)
律诗中的“对仗”及其英译·····	(131)
从翻译的过程谈古诗的今译与英译·····	(139)

主题五 翻译作品的评论与比较

梁实秋译《失乐园》中的一处明显错误·····	(151)
在比较中鉴别——谈名篇“Three Days to See”的几种译文·····	(155)
《春怨》九家译 得失堪评析·····	(161)

主题六 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的培养

英语热与翻译人才的紧缺·····	(171)
词典与翻译·····	(176)
关于本科翻译教学的思考·····	(183)
翻译课：“五个结合”的高年级技能课·····	(189)
后 记·····	(195)

我与翻译的不解之缘

(代前言)

本书所选 25 篇文章均是与翻译有关的，有漫谈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有评论译品的，但更多的是探讨翻译理论与技巧的，较为集中地研究了国俗词语与国俗语义的汉译英及中文古诗汉译英的比读与研究。作者另有数量略多的外国文学研究与英语语言及教学研究的文章发表于各种期刊，均不在选用范围之内。选文记录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阶段学英语、教英语、做翻译的体会与心得；但因为本书仅选翻译研究方向的文章，所以在这“代前言”中只说我与翻译半个世纪中的不解之缘。就翻译而论，我的活动涵盖翻译实践（英译汉、汉译英，涉及多种文体及类别）、翻译教学、翻译研究，而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和促进。下面的数节文字大体以时间为序，三个方面结合或交错叙述，记录半个多世纪我在学英语、做翻译、教翻译课程和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方面所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以及取得的些许成果。从中可见我在求学和执教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

1956 年春夏，我在临海师范学校（中师，后称台州师范，即台州师专和台州学院的前身）即将毕业准备按祖国需要被分配去当小学教师时，党和政府动员师范毕业生去报考大学，但只限于报考省内及上海的高师院校。报考什么专业？我当时有一种模糊的“外向型”想法，既然能离开山沟沟，将来就要在城市里谋一席立身之地，若能接触外国则更好。因此，我选择报考华东师大和浙江师院外语系。1956 年的中国正处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中学的外语课几乎就是俄语。可碰巧这一年国家决定在华东地区五所高等师范院校中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后首次恢复招英语专业学生。又因为那一年的高考不考外语（外语专业考生也不例外），虽然我未读高中英语，却成了浙江省这批为数不多的英语专业学生之一。

1960 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并留原杭州大学当助教。正如老同学郭建中教授所说：“四年的本科学学习，有两年时间是在下乡、下厂劳动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实际用于读书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年。因此留校任教后，深感业务底子薄弱，



只得认真进修，以弥补四年本科学习之不足。”（《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一书的“前言”）我的机遇很好，工作第一年领导让我配合老教师蒋炳贤先生（我本科阶段教过我的仅有的3位教授之一）做一个班的英语综合课的教学工作。一年过后，从发展需要考虑，领导让我脱产进修两年，其后要独立挑起高年级翻译课的任教任务，并明确蒋先生为主做我的指导教师。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听过赵冕教授的若干翻译讲座，感到有趣也有收获，现在组织上让我进修，并准备开翻译课，我是很乐意的，况且蒋和赵两位老教师与我同办公室，向他们请教很方便。因此，1961年夏至1963年夏两年间，在多位老教师的指导下，我有幸较为系统地读了不少书，主要是西方文学与文化方面的英文原著，其间，为直接准备翻译课还短期去复旦大学听课并拜师。

巧的是，正当我准备开翻译课时，1952年院系调整后离开老浙大先后任教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张君川教授（莎士比亚专家、戏剧理论家）调回杭州，领导让张先生在任教英美文学选读之前，主讲了一年翻译课，由我当助教并改学生的翻译练习。在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间的两个学年中我直接试教了翻译课。其间，蒋先生与张先生同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成了“忘年交”，但用当时时髦的术语来说，叫做“青老帮教结对子”。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翻译成了我的主攻方向，教翻译是当时党交给我的任务，同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原来的一切进程打乱了，也让我整整浪费了十载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不过，其间，同翻译有关的也有过一次有益的实践。1971年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席位，有许多联合国相关资料要译成汉语。浙江省由陈桥驿教授领衔接受了南亚6国的国情资料翻译，我受命义务译出了其中一国的初稿。应该说，在那个年代，这样一次实践是我走上翻译之路的难得历练。

二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外交往多起来了，英语开始热了。数年前，我已主动调离原杭州大学，来家乡台州师范专科学校（一度亦称浙江师院台州分校）教英语专业学生，致力于培养中学英语师资。但我并没有与翻译绝缘，相反，英汉与汉英翻译实践大增。

英汉翻译方面主要是结合大量阅读来自美国的原文期刊（有友人经常提供），选择好文章译成中文向国内书刊出版部门主动投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有一位极佳的合作伙伴，1975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英语专业的师弟郑明治同志，时任温岭县某中学英语教师、校长。从1979年始到1984年的5年中我们交往密切、真诚合作，选译了约40篇文章，投稿并被录用的有30余篇，刊于全国各地20来家报刊，以

甘肃的《读者文摘》(即现在畅销全国的《读者》)、北京的《环球》、山东的《知识与生活》及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西、贵州等省的青年或妇女、老年等方面刊物为多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译作当属刊于《读者文摘》1981年第2期的《何谓“名著”》一文,它现在在网上广为流传,也曾被选入很多种选本及文集中,有我们见到的,也有不知道的,较近和较重要的是该文作为说明文范文被选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大学写作教程》(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课通用教材)。我与郑明治同志合作做翻译持续了五个春秋,不得不告一段落,原因是他作为青年才俊在1983年开始的干部“四化”过程中,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当上当时新生的椒江市副市长,然后一路前行担任过台州地区侨办主任、浙江省侨办副主任、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兼浙江省商会副会长、正厅级巡视员。现在,刚过花甲之年的他,退休了,但仍忙碌地工作着,身兼数职,担任浙江圣奥慈善基金会会长、浙江大学特聘教授、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浙江通志》副总编等职。这30年来,我与他由合作做翻译而结下的深厚友谊,与时俱进,长青不谢,目前我们正一起筹划出版一本翻译作品选。

在做时文(来源主要是当时最新出版的原版 *Reader's Digest* 杂志)英译汉时,常常对照阅读报刊上别人的译作,又因我曾数年任教英语阅读课与英美报刊选读课,于是我把译过及读到的许多美文带进了课堂,作为教材。在这个“阅读—翻译—教学”一条龙的过程中,我在理解原文和翻译能力上得益匪浅,也为我随后写文章做研究打下基础,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语义层次与翻译”、“词典与翻译”等。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的汉译英实践也很多,不过难以统计,也拿不出代表作。译什么东西?改革开放初期,涉外的各种资料都碰到过:地市县的介绍、政府部门的涉外文档、领导的讲话和招商引资项目、旅游景点汉英对照宣传资料,还有工厂企业、出口产品介绍,等等。都是人家找上门,我不便拒人门外,只好抽业余时间不时做一些。有味同嚼蜡的,有啃硬骨头一般的,当然也有驾轻就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熟能生巧,在实践中提高了翻译能力。这对我以后教本科生翻译课、改学生翻译作业及写论文与承担高难度汉译英任务(如参与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化背景汉英双解词典》)都很有帮助。

有件事还可在此提一下。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有一次赴国外担任现场口译的实践,替当时轻工业部派出的一个技术引进团做专任口译,工作地点是瑞士苏黎世及附近,为时一个月,团员有相关研究所的高工、技术引进工厂的厂长和技术人员,工作方式主要是替瑞方接待人兼授课教师(身份是工程师)在多处现场的讲课和示范时做英汉互译。我顺利完成口译任务,瑞方满意,他告诉我,他接待过同类团中我们是第五批,其中有三个团的译员因听不懂说不出难以工作,结果只好到瑞士大学里找中国留学生做德文翻译。我估计那三个团的译员可能是本企业懂点技术又懂点



(至少他或她自认为懂)英语的人或外聘的滥竽充数的翻译。我正式做口译这是第一遭,我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不算强,但多年高校英语教学经历使我能轻松听懂外方人员讲话的内容,遇有听不太明白的技术性强的词句就用课堂上英语“paraphrase”的方法与讲课人交流一下,理解后达到明白无误时再译。而作为做过不少英译汉笔译的我,也会恰到好处地交替使用“直译法”和“意译法”。有意思的是,团员中有一位来自某轻工业部直属研究所的上海高工,他懂俄语,英语只知一些专业术语,年龄与我相近且与我同居一室,两人关系颇好,因此常在现场当我译对意思而术语方面用词不准确时,他会恰到好处地补充说出有关术语,让中方参训人员听得明明白白,也让我受益。

三

20世纪90年代是我做翻译及从事翻译研究的黄金时代,虽然这时候我已年过半百,因为“文革”我失去了十多年专心钻业务做学问的时间,到了90年代碰上好政策好时光,我有精力特别充沛的感觉,做事效果也好,有时真的“事半功倍”。本书所选论文中有过半(15篇)发表于1991年至1999年间,其中过半(8篇)文章刊于专业核心期刊(《中国翻译》、《外语研究》、《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杭州大学学报》等)。这期间,我与王建华同志(我校早期留校任教的毕业生,后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教授)等一起搞了个国俗词语翻译研究的省(教育厅)课题,成果丰硕,由我们选编、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俗语义研究》(1998)一书,内收我的相关论文4篇(《论语义的国俗性与国俗语义的可译性》等)。

90年代中,我在翻译实践方面也上了一个台阶。时文翻译做得少了,文学作品的英译汉明显增加了。80年代我已翻译并发表了一些英美的经典小说,如《悔悟》入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宋兆霖编选);《最美好的岁月》(中篇)刊于《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3期;《分水岭上》入选198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波希米亚女郎》(朱炯强选编);《活僵尸》(长篇法制小说,与人合译,第一译者)198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进入90年代,我翻译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约有20多万字,除配合老朋友朱炯强教授编选及出版《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澳大利亚新西兰卷》译了《滑稽角色》和《退休生活》两篇以外,更多的是配合老朋友郭建中教授主编的《科幻之路》六卷系列的翻译和出版,我译了其中第一卷及第五卷(1997年和1999年先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中多篇科幻中短篇小说,如《太阳城》、《新亚特兰蒂斯号》、《淹死的巨人》、《生命的出现》等。还有由我负责和主译的科幻短篇小说集《太阳的金色苹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90年末,准确地说,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我在英译汉实践园地上参与了一

件大事、难事。在郭建中教授相邀之下，做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图书《麦克米伦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我主译 H—M 字母内的所有条目，据出版社给我的正式证明，我译的部分合计字数约为 82.5 万。该百科全书于 2002 年出版。我记得自己主要是利用 1998 年、1999 年两个暑假做翻译，不折不扣地挥汗如雨（蜗居中没装空调，只靠一台小电扇通风）；百科全书的内容是真正的百科俱全，各类词条该碰的全碰到过，记得翻译时对理科的一些术语常有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好在校园内几乎各科专家均有，我就向他们请教。后来，出版部门邀各科专家对口审校译稿，据责任编辑事后相告，我译的那些专门术语还是相当准确通顺的。经此番磨炼后，我做英译汉更趋成熟。

关于工具书翻译，此前数年间，我参加了《当代英汉双解分类用法词典》的英译汉工作，完成约 10 万字工作量，该词典于 1994 年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在 90 年代中叶，参加了当时由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领衔主持的一个大项目，在《中国语言文化背景汉英双解词典》中作为汉译英的人员之一完成 500 多条目，内容范围属综合型，以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词条为主。该词典于 199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项工作是我从事汉译英的最大的一次实战，同时也对我在此期间参与的国俗词语的研究课题以有力推动，给了我在翻译领域中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好机会。

1994 年起，在中止了近 30 年之后，我又走进英语专业本科生课堂，从事翻译教学。我在原杭州大学教翻译课止于 1966 年的“文革”，改革开放后我任教于台州师专，英语专业专科生一般不系统开设翻译课，我主教英语精读课或英语阅读课。到了 90 年代中叶，台州师专与浙江教育学院合作持续并大量招收“专升本”（中学英语教师继续教育本科学历）班级，随后成人教育中也有英语专业本科班，我主教他们的翻译课；紧接着台州师专于 1997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到了 21 世纪学校正式升格为台州学院，我的翻译教学对象从进修生转为普通高校本科生，到 2008 年夏天（我退休不再授课）为止。我虽然也兼教过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英语词汇学等课，但我主要担任翻译课的主讲教师，持续时间达 15 年之久。

四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1998 年到 2007 年间，台州师专正式升格为台州学院，紧接着又迎来了教育部派专家组进行合格评估，所以，客观上因工作需要我未能如期退休；这十年间我作为校教育督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与“升格”与“评估”（包括“迎评”）相关的会议与活动多得很，我得全程参与。也正是这期间，高校大幅度扩招，我所在的外语学院英语系招收本科生从最初一个班（1997 年）逐年增加到两个班（1998 年）、三个班（1999 年）、四个班（2000 年），



然后便是多年保持年招八个班,均不计同时招收的外贸专科英语四个班。因为翻译课开在三年级,这样,2003年之前我一人任教翻译课(指笔译),并在2004年独自一人完成该课程建设,编写了整套讲稿、系统练习材料及参考读物。此后,王爱琴副教授等多人加入到任教翻译课的队伍中,实现了老中青结合,多种职称和学历的教师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教学团队,这让我为事业后继有人而深感高兴。于是,从2005年始我们进一步努力,想把我院的翻译课建设成省级优秀课程,第二年(2006年)又引进了一位海归教授(高万隆先生)充实到翻译组来,这使我们有如虎添翼的感觉。终于在2008年5月,我们的翻译课程被评为浙江省高校精品课程,当时是省内同类课程之唯一。此后我“裸退”了,我的翻译教学也画上一个句号。

新世纪之初,我的翻译实践较少了,但有一项成果值得一提。应北京一名责任编辑的组稿,我译了一部未来学专著,作者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未来学家艾伦·塔夫(Allen Tough),原著是20世纪90年代初面世的 *Crucial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我的译著便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40年后会怎样——你可以见到的未来》。

这几年间,我的翻译研究领域重点转向了中文古诗词的英译上。我缺少国外翻译理论方面的新资料,在前阶段探索国俗词语及国俗语义汉译英的基础上,目光更专注于民族的、古典的遗产,精心阅读了数十本古诗英译对照本及研究古诗英译的专著,也随时记录点滴滴滴的体会和心得,先后写出了“汉诗英译之形式述评”、“律诗中的对仗及其英译”等一组文章,并得到了当时的校长、党委书记蒋承勇教授的及时鼓励和支持,历时两年进行整理、补充,逐步形成一部专著,那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末出版的《汉语古诗英译比读与研究》。

五

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一直参与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得益匪浅。我所在的临海城虽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直至20世纪末,交通不便,不通火车,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乘汽车到省城杭州要一整天(8—10小时),因此在互联网开通前,信息不畅,学术气氛不浓。为了学翻译,从《翻译通讯》到《中国翻译》我一期不漏地订阅;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所举办的会议凡就近的而我又得到通知或邀请的,我都努力争取参加。参会是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为了参会事前要准备论文,这也是对我很有力的鞭策。如选入本集的“《春怨》九家译得失堪评析”当初是在亚洲第三届翻译家论坛(2001年冬在香港大学举办)分组会上的交流发言底稿;“探讨几项重要旅游资源的英译”是为中国译协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汉译英研讨会(2004年夏由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承办)准备的论文;

“从翻译过程谈古诗的今译与英译”是为一次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2006年春在苏州大学召开)写的,并被编入《翻译研究新论》(王宏主编)一书。

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逐步面向全省开展活动,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坚持参加省译协的业务活动。其时我被选为理事,至今不曾间断;最近10多年中任常务理事。25年间我参加过省译协举办的许多会议和学术活动并从中得益,但作为翻译教师,我认为,省译协于2007年1月始,在时任会长郭建中教授倡议下举办的浙江省高校翻译教学研讨会(含笔译与口译教学),最切合实际需要;2007年6月第六届省翻译协会召开后郭教授卸任。此后4年多时间中,在新任会长范捷平教授的领导下,每年举办1—2次这类研讨会,对促进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的培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浙江省译协成立后,在上级及主管部门指导帮助下,由我牵头筹备并在1986年成立了台州地区(市)翻译协会,任会长至2003年。市译协与市外文学会合并成立台州市外文与翻译学会,我任理事兼名誉会长。台州翻译协会成立后的16年时间内,在多位秘书长及理事们的具体操办下,年年有活动,与临海、椒江、黄岩、温岭、仙居等市县翻译组织与涉外单位及企业一起开研讨会并开展翻译服务,为改革开放、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做出一定努力,做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有益事。

毛华备

2011年10月

于台州金谷公寓

主题一

英译汉要把握词义理解